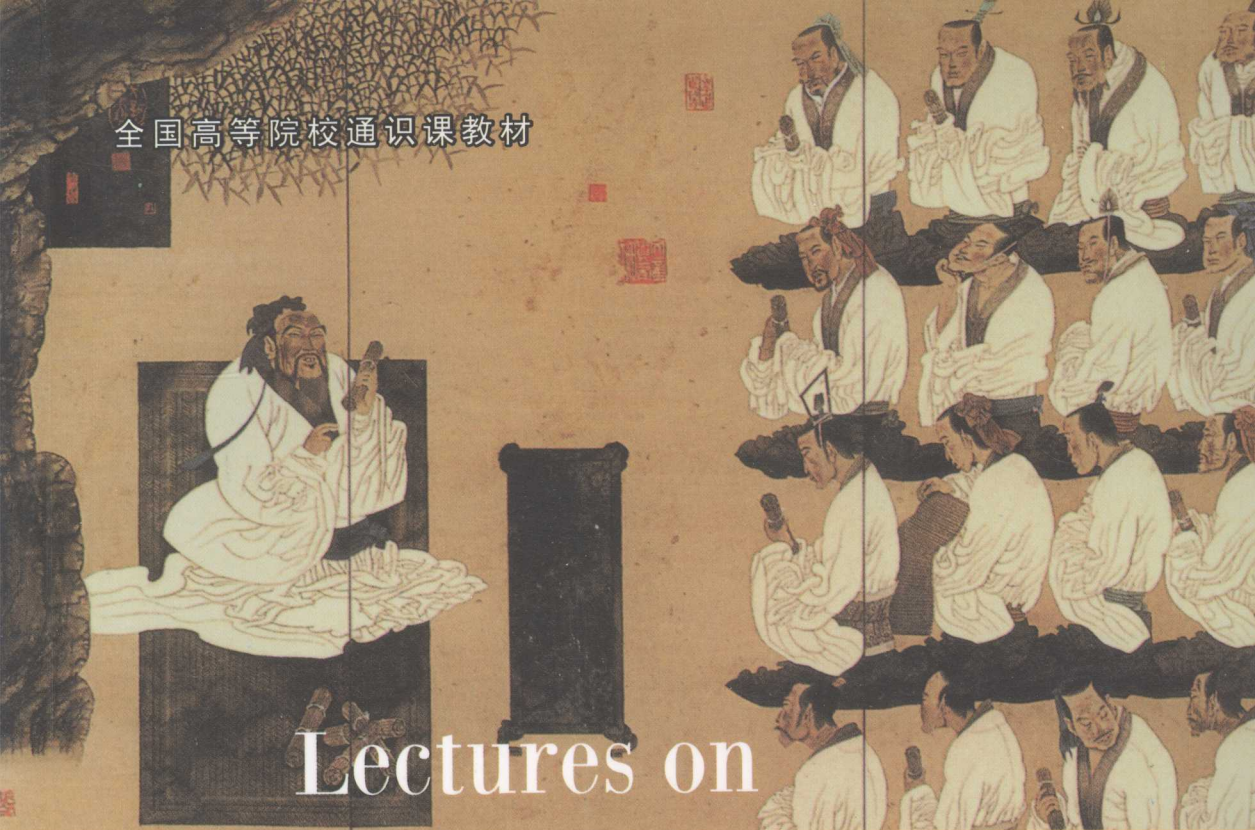


全国高等院校通识课教材



Lectur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华文明讲演录

俞学明 赵晓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69178

K203
252

全国高等院校通识课教材

中华文明讲演录

Lectur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俞学明 赵晓华 主编



北航

C167634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203
2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讲演录/俞学明,赵晓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1-23117-3

I. ①中… II. ①俞… ②赵…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7167 号

书 名: 中华文明讲演录

著作责任者: 俞学明 赵晓华 主编

策 划 编 辑: 曾 健

责 任 编 辑: 陈 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3117-3/D·3409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新 浪 微 博: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子 信 箱: yandayuanzha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431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中华文明讲演录

中华文明讲演录

目 录

导论

- 003 文明、文明观以及文明的历史与未来 / 俞学明

经邦治世篇

- 023 政治文明：制度架构及其流变 / 杨阳
042 中国古代法律的理念与制度 / 张生
062 君主真的是“言出法随”吗？——中国古代权、法关系的演变 / 林乾
089 世卿世禄和选贤任能——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 阎步克
100 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土地关系：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 秦晖

文化信仰篇

- 121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 / 冯时
142 儒家与礼乐文明 / 张学智
160 平和之心与一己之福：中国人的信仰体系 / 程乐松
182 中国四大小说名著的文化价值 / 郭英德
200 书法与中华文明 / 孙鹤

社会生活篇

- 231 历法与中华文明 / 左玉河

246 衣饰文明与中国社会变迁 / 赵晓华

262 中国传统婚姻与家庭述论 / 黄东

284 中华文明与中医 / 翟双庆

293 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 李虎群

革故鼎新篇

311 现代化与中国文明的反思 / 马勇

324 “走向中华文明的未来”论纲 / 丛日云

335 现代语境里的儒教思考 / 陈明

340 回到梁启超,回到“新民” / 王人博

343 后记 / 俞学明 赵晓华

Lectur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ents

Introduction

- 003 Civilization, Its Concept, History and Future / by Yu Xueming

Governance

- 023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volution
/ by Yang Yang
- 042 The Concept and System of Chinese Ancient Law / by Zhang Sheng
- 062 The Progres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Law in Ancient China
/ by Lin Qian
- 089 The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ials in Ancient China / by Yan Buke
- 100 Land Relations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 by Qin Hui

Cultural Beliefs

- 121 Chinese Ancient Astronomy and Humanities / by Feng Shi
- 142 Confucianism and Civilization on Ceremony and Music / by Zhang Xuezhi
- 160 Chinese Belief Systems / by Cheng Lesong
- 182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China's Great Four Novels / by Guo Yingde
- 200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 by Sun He

Social Life

- 231 Calendar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 by Zuo Yuhe
- 246 Dress and th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 by Zhao Xiaohua
- 262 On Chinese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 by Huang Dong
- 284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by Zhai Shuangqing
- 293 Anchorer Ethos in Ancient China / by Li Huqun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 311 Moderniz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 by Ma Yong
- 324 Outline on “ the Fu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 by Cong Riyun
- 335 Reflections on Confucianism in Modern Context / by Chen Ming
- 340 Back to Liang Qichao and his “ New People ” Doctrine / by Wang Renbo
- 343 Postscript / by Yu Xueming Zhao Xiaohua

导 论



文明、文明观以及文明的历史与未来

俞学明*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这门课叫做“中华文明通论”,它的设立,顺应了当代流行于国际教育界的通识教育理念。国际教育学界反思以前培养人才的教育,认为过于侧重了专才教育,开始形成一种理念:大学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塑造人。近年来,我们常常听到高校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事实上,梅校长还说过:“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①也就是说,在梅校长看来,通专并重的提法是不对的,应该是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提醒发人深省。那么,如何来开展通识教育?冯友兰先生在回忆以前的清华通识教育时,指出当年存在两种意见:一个是培养“人”,一个是培养“机器”,这里的机器是指专才或者是不重视通识基础的专才,这样的讨论当时每次开会都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折中的结果其实跟我们现在实行的差不多,即一、二年级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专业为主。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是这么做的。三四十年来这些大师的思考依然是我们开展通识教育的基础。学校开设这门中华文明课程,是希望大家在大学里不仅仅学习技术化、专业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你们是有共同的过去或者说是拥有同一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意识到你们要期待和建设共同的未来。在我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论证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大学教育只是强调科技和技术化、工具性、专业化的教育,那是不可能使公民自觉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过去’即属于同一历史文化共同

* 俞学明,哲学博士,现为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宗教學,主攻佛教哲學、唐代佛教宗派關係、天台宗等方向,代表著述有《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興問題為線索》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唐佛教宗派衝突與會通的思想史意義”、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佛道教與唐宋法律”等課題。

① 梅贻琦:《大學一解》,載《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

体,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分享‘共同的现在’并期望‘共同的未来’。只有让所有受教育者都接受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文教育,才能达成以教育塑造‘共同体’、打造‘中华文明熔炉’的效果。”因此,“破除专业壁垒,打造文明熔炉”是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我们也希望中华文明通论能够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贡献。中华文明通论设课之初就确定了具体的课程目标为“向学识真、闻道求实、博雅文明、心仪君子”,我觉得非常好。现在,我们依然沿用并且为之努力,希望我们的课程能够成为“有灵魂的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上有个短板理论,一桶水的容量往往为最短的侧板的高度所决定。我认为,作为教育者的老师尽量不要去做侧板,更不要无意间做了那块最短的侧板。因为侧板高了固然有益,但教育不可能揠苗助长;如果做了最短的那块板,那甚至意味着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高度。我觉得老师应该去做那块桶底,让学生自己去建设侧板,我们尽量拓展桶底的范围,把成长的空间留给大家。这门课我们邀请的都是各个专业领域有很深造诣的、有见识的非常优秀的老师,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么一个并不很大的课堂容量里,尽可能地拓展大家的视野,促进大家的思考,让大家在未来的人生中,有更为开阔的桶底,去建设自己的桶高,装更多的水。

今天由我来讲“导论”部分,导论的主题是“文明、文明观以及文明的历史与未来”,主要讲我们怎么来听这个课以及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课程内容。

可能大家会说,不就是来课堂听课、课下阅读参考书、结束后考试么?还能怎么听呢?我认为,思考“怎么来听”这个问题对“听到的是什么”很重要。我们可能听到过《在路灯下找钥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把钥匙丢了,他就在路灯下找,路人问他:“你的钥匙是丢在这里的吗?”他说:“我不能确定。”路人说:“你不确定,你怎么只在这儿找呢?”回答说:“因为只有这里是有光亮的。”对于这个故事可以从很多角度理解。我在这里引用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我们总是甚至只能在“路灯”下理解我们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了解的途径主要是看书、看文章或者听课。比如听课,我们总共有十几个老师来讲,每个老师都从某个角度或专题来阐述一个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不一,大家都是根据老师讲的内容以及书上看到的作为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并不是这些老师就能讲全中华文明的完整形象,但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渠道去了解,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看到光亮的地方,我们只有通过前人所给予我们的知识和框架来了解这个世界。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表明的是,我们了解的中华文明即“我看中华文明”“我眼中的中华文明”,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我”在看,这就意味着受到“我”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现在在看”和“鲁迅先生在看”不太一样,为什么?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鲁迅先生所处的环境、他的性格等。同时,对于“我看中华文明”,可能还要注意到,除了受到“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历史”的客观影响以及“看者”自己的特点之外,还要关注“我去看什么”,即我选取什么材料和“我怎么看”。也就是说,我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

和看到的是什么之间是有关联性的。比如说有一个人站在北京街头,说“北京真好真繁华”,另外一个人说“北京有什么好的,人多车堵物价高”,“人多车堵物价高”和“繁华”都存在,主要在于你选取的是什么样的角度、工具或者视角,这对于你看到了什么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认识世界或者社会的过程中,看什么和选取什么样的材料非常重要,它往往决定着你能看到什么;而知道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角度对于我们认识内容的影响,则能够知道我们思考的局限,更加理性地了解和运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

联系到这个课程,当我们去看中华文明的时候,我们是选取了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某些东西作为我们考察的对象。为什么会选取这些材料呢?是因为我们用某一个视角去看世界,我们用“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历史,文明是近现代以来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

一、文明是近现代以来对于人类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

对于人类历史的解读方式有很多种,这些解读方式还会有变化。比如说思想史,它很关注伟人的思想,所以很多的历史书都是以伟人的思想进路为线索的,你可能会看到秦皇汉武唐太宗,可能看到孔子老子王阳明,但是很难看到一个小人物,他们往往被忽略掉。但现在思想史研究里还有一个解读维度,认为能够真正表现社会的有一部分是小人物的思想,是民俗、社会生活,比如对于当代社会现状的真实了解,不是看学者怎么说,也不是看国家领导人怎么说,而是看在街谈巷议的人们怎么表达、看网民如何表达。可想而知,这样两种观念下写出来的思想史就不太一样。同样是思想史的解读方式,从前者中可以看出历史是由英雄人物的足迹构成的,从后者可以看出思想史何等的丰富,各种各样的合力组成了社会的历程,所以我们看到的思想史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当我们用“文明”的方式看待人类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解读的角度,正如我们在北京的街头看高楼大厦一样,它解读的是高楼大厦而不是贫民窟。人们对于什么是文明以及文明从何而来的观念和文明观影响了人们对人类社会与历史的解读,这样也就影响了对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的解读。

用“文明”解读这个世界的历史并不长。“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8世纪的时候正式被用作名词。文明最初是对个人行为的判定,从最开始的“宫廷礼仪”逐渐发展而来。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密拉波有一本书叫《人类的朋友》,在这本书里最早提出了“文明”这个概念,除了用于指称以教养和礼貌为核心的行为外,还被用于对社会的描述上,比如文明社会,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是“人类介于贫穷而野蛮、富裕而堕落之间的一种繁荣和具有真正道德的生活状态”。最初人们在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阶段时,不仅仅看社会是否繁荣,

人们是否有道德、有节制,因为这些是很难判断的,而是注重它的客观基础。

从词源上来看,文明是从市民(civis)、城邦(civitas)演化而来的。当人们用“文明”来解读社会与历史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城市”。把城市的形成视做早期文明产生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的解读方式重视的是城市化的过程,是人类生活城市化的发展史。当然,除了城市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字,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从直接交流转化为一种更广泛、更间接的交流,使得人的历史可以有记忆。还有阶级、国家、社会等都被认为是文明存在的标记。文明史学者曾提出的文明标志有:城市、国家组织、文字、宫殿庙宇以及大型建筑、青铜器等,摩尔根、恩格斯则以文字、天然物的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学者用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文明的因素去整理整个社会历史,每个人描述的框架结构是不一样的,对文明程度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真实。总体而言,文明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能够显示出人类集体力量与成就的状态。文明的概念很复杂,诺贝特·埃利亚斯曾指出:“‘文明’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仔细观察的话,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要用几句话囊括‘文明’所有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①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人类的行为都是在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二者之间有相对性。在这背后是不是有一种价值的评判呢?

18世纪以来,文明的反义词主要有三个,即“原始”(primitiveness)、“野蛮”(barbarism)、“蒙昧”(savagery)。文明有程度上的不同,意味着在“文明”的视野里,世界历史不是一体化的,同是在这个社会,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有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文明是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文明社会还存在着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发展。在“文明”理念的影响之下,从18世纪开始,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工业革命、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理性的发展,这一系列的“文明”元素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优势。这种评判,到现在为止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文明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在用西方文明的标准评判自己。

那么,西方人是不是一直这样认为呢?其实西方人的理解也有变化。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明的负面作用。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认为,人类可以从文明中获得“物质生活的舒适,知识的增进与传播,迷信的衰落,相互交往的方便,举止、态度的温柔,战争与个人冲突的减少,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持续地减少,集全球众人之力所完成的伟大工

^①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页。

程”,但文明也造成人类自主能力的丧失,人造品的生产,单调、刻板的机械式理解,不公平与毫无希望的贫穷等。^①在19世纪中叶以后,那种线性发展的文明理论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它已经不再是完全占据主导性的文明理论。19世纪之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地域文明理论。人们认同各种地域都存在文明,也存在在价值上跟西方文明不一致的文明。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传统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人不一定非得跑向进步。到了20世纪以后,对于文明的质疑的声音就越来越多了,出现了对文明本身的反思,比如说,有人开始反思文明是否有副作用,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的多样性在丧失,人们又开始寻找原初的东西。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在这个过程中,人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世界上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还没被认识的事物”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的思想,但是这种理性的信心在近代以来受到三次打击。第一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强调人不是上帝的造物,人是动物演化而来的;第二次打击是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潜意识的支配,人的理性只是“冰山一角”,这就意味着人非但不是上帝的宠儿,而且人能够自我决定的东西非常少;第三次打击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意识到即使是人类群体对理性的控制也是有限的。这一系列的事件引起了西方文明史家的反思。比如说斯宾格勒,他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甚至提出西方到21世纪初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进入西方文明的帝国阶段,他认为这就意味着西方文明已经进入到没落的阶段,他把时间表都定出来了,在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西方文明肯定是要呈现衰相,这是斯宾格勒的看法。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超越了民族、国家,勾勒出21种成熟的文明,对每一个文明的起源他都有自己的思考。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提出了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几百年,在地球的不同地域比如古希腊、希伯来、中国和印度出现了在后来影响文明几千年的思想,他把它称为轴心期。轴心文明是谁创造的?不是西方人创造的,也不是古希腊人创造的,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创造的,整个人类迄今为止都在分享着轴心时代的文明成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进一步发现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对话理论开始盛行。什么叫对话?对话不是一种说服的理论,不是说服或者被说服,对话是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于是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点。人类是共生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包含你的关系。在茫茫宇宙中人类驾着地球这么一叶扁舟,必须同舟共济,必须在人类的文明中互相宽容、互相包容。所以西方的文明理论,也都在变化。

^①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页。

因此,当我们现在谈文明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说我们用西方人的眼睛看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是在用谁的眼睛看中国,或者说用哪个西方人的眼睛看中国。

二、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①《易·大有·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谓五也,‘大’者皆见‘有’于五,故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②

尽管“文明”的用法在中国古代就有,且其内涵与 civilization 所表达的人类的群体力量和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我们现在对于文明以及人类文明史的考察,受到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深刻影响。那么,在这样的影响下中华文明是怎样被解读的呢?

近代以来对“中华文明”的解读,一直隐含着是中华文明好还是西方文明更好的对比,主流的观点是中华文明处于弱势而西方文明处于强势;还隐含着中华文明是否能发展到像西方文明这样一种强势的状态的期盼。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也大多以西方为发端的工业文明、现代化为建设的楷模。

其实,在西人眼中的“中华文明”,也不是一直如此。

中西文明交流中,我们往往会提到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他17岁时随父亲与叔父从威尼斯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历经艰辛,到达大都(今北京),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在元朝任职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1295年回故乡。在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见闻录》)中,第一次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展现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该书在欧洲各国流传,极大地开阔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眼界和对中国的认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可以说,它也推动了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说,著名的探险家哥伦布就很爱读游记,1492年他率船队进行第一次探险时就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至今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中所存遗

①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卢光明、李申整理,吕绍刚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②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廖明春、陈明整理,吕绍刚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物尚有拉丁文译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到17世纪,穿中国的丝绸、用中国的瓷器、喝中国的茶叶,成为欧洲贵族的时尚甚至是声望的表现,以至于“中国制造”的有些功能被大大神化,如中国瓷器被奉为圣器,可驱邪杀毒。

中华文明作为另一种灿烂的文明为西方人所惊叹,也为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运动提供了资源。现代西方文明的发生、发展,源于对中世纪文明的强烈批判。回到古典,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个人尊严为旗帜,唤起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利的渴望,这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东方文明的发现和赞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突破西方式孤岛自守思维的源泉。

莱布尼茨(1646—1716)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我们的民族存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国民族。”^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阐述人类文明的历史著作被视为开世界文明史之先河。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用很大篇幅、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中国,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方面均优于西方国家,甚至说“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踟蹰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②,“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新教派的诬蔑……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③。他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所写的书籍和信件来了解中国,虽然由于传教士为论证在中国传教的意义和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而使得其叙述不尽客观,但以中国为楷模来批判中世纪西方的封建制度,这种美化是符合伏尔泰的目的的。

当然,近代以来除了崇仰中国文化的启蒙学者外,西欧还有否定中国文化的另一极,他们以18世纪以来亚当·斯密(1723—1790)、黑格尔(1770—1831)等为代表。他们透见了东亚文化发展的迟滞性,判定它是一个缺乏活力的系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人口庞大,人民勤勉。然而,很久以前,它就陷入停滞状态。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中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几无二致。或许可以进一步推测,早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之前好久,中

① 转引自冯天瑜:《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载《光明日报》,2010年8月31日。

②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7页。

③ 同上书,第88页。